

“吱嘎吱嘎”牛车响

老照片

桑金伟 文/摄

现在，“赶牛车”似乎成了艰苦创业的形容词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说：“我们是赶着牛车创业的，现在是高铁时代了，有些人没有‘买’上票……”其实历史上，牛车有过一段风光岁月，在汉末魏晋时期，牛车甚至是士大夫的“高端配置”。

中国的牛车起源很早。据文献记载，在黄帝时期，人们就已经开始“服牛乘马”。

牛能负重且耐劳，但速度慢，故牛车多用于载物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牛车开始广泛用于载人；汉代时牛车已成为一种主要的交通工具。牛车多为农人下田载禾，因此又称其为“柴车”。但“柴车”的地位低下，不能上大台面，贵族通常乘坐马车出行。

然而，从魏晋到初唐时期，人们一反常态，倒以乘坐牛车为荣了。牛车地位之变化事出有因：一是东汉末年战乱频仍，马匹减少，使牛车走上前台；二是古代车子多用木轮，行车颠簸。牛步履稳健，车速慢于马车，颠簸自然减轻，因此牛车反而舒适；三是魏晋时期玄学兴起，贵族和士大夫崇尚自然、不拘礼节、率真任诞，慢节奏生活方式成了时尚。性格温顺的牛，拉着一辆徐行的车，能为玄学人士提供所需的心境；四是乘牛车得到朝廷推崇，并在上层社会成为一种制度。有关礼制规定，不同等级官吏乘坐的牛车，有不同的规格，如车篷的颜色、质料和车身装饰等都有区别。到晋代，牛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一度超过了马车。

到了隋代及初唐，达官贵人乘牛车之风仍很盛。直到唐太宗讲求“马政”，大力发展养马业之后，马匹渐增，马车才再次应用于社会生活之各方面，牛车也再次回到农业及短途运输上。

在牛车短途运输方面，宁波历



慈溪长河镇大云村的牛车路



20世纪70年代的木轮牛车



2017年，在路南海西海岸农村看到的铁轮牛车

史上值得追溯的是庵东的运盐牛车。

《庵东镇志》载：“民国时期原盐外运主要靠沿海运输，沿海运盐要口，东边有周家路湾、新湾、马家路湾、崔陈路湾、高王路湾、张家路湾等……原盐由场内出仓，用牛车或驳船运至港口装上海船，运往各地。”

“民国时期修筑的芦庵公路，为境域最早公路，亦为原盐外运之唯一公路，其余皆为牛车泥路。”“牛车，用牛拖拉的车辆，有两个木轮，直径约1.5米，一架车板，由一头牛拖拉，载重量可达1.5吨。清朝末年以前，为境域原盐运至的主要运输工具。1950年，庵东盐区有793辆……”

为互证，我又在《慈溪交通志》中查到记载：“牛车……由一头或数头牛拖拉……”“庵东地区各盐仓至内河、外海（码头）的短途搬运，自清末以来，一直使用牛车。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，有牛车1000余辆。抗战时期大量减少，至民国三十四年底，仅200余辆。民国三十七年，牛车数又回升

到701辆。1950年，庵东地区有牛车673辆。”

虽然“两志”记录稍有出入，但牛车数量之多是我始料不及的。显然，盐区牛车解决的是盐仓至装船地短途驳运事宜。《慈溪盐政通志》说：“出仓至装船地点远近各异，少的几里，多的十几里不等。”“内河原盐放装船地点，民国以来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均在五塘或四塘一线。外海装盐，涨潮时，海船可以进入江湾装盐，潮小时，须用牛车拔沙，涉水至船边装船。”这时需对牛车夫增发“拔沙费”，可见牛车夫和牛都很辛苦。

秦秋谷曾在1940年3月22日《新华日报》发表过《抗战中的浙东余姚盐民》一文：“这一带的路是牛车路（牛车是盐场的特色），这路比平地高起三四尺，好像高起的火车道一样。成群的像骆驼般高

大的牛车，载负着千斤以上的沉重的盐包，把泥路陷成一条条深深的坑道。”

从秦秋谷的叙述，我推测早在盐区应该会有供牛车行驶的牛车路，但《慈溪县地名志》无载。在老乡指点下，我找到了原属盐区的今长河镇大云村一段有路牌的牛车路。住在附近的长河镇退休老干部王成铨对牛车印象很深，他说：牛车总是很吃力地前行，木头轮轴发出“吱嘎吱嘎”的响声，车边挂着油壶，添些油，吱嘎声就会轻点。他就是伴着牛车声长大的。

后来，在《慈溪地名志》编写室，我欣获该牛车路的详细信息：“该路为牛车运盐主要道路，故名牛车路。地名的历史沿革：始建于清咸丰年间，泥路。1979年6月拓宽改建，砂石路面……地名沿用至今。地理实体概况：位于大云村。南北走向，南起四塘江，北至

七塘公路，全长2000米……”

从大云回来后，我一直在思考，庵东盐区这么大，牛车如此之多，牛车路肯定不止一条。之后，在阅读《庵东镇人和街店舖示意图》时偶然发现，图上有两条路标注着“牛车路”，一条在东街头，另一条在西街头。不由得眼前一亮。翌日凌晨，我骑车前往，在庵东镇同仁的热心帮助下，不仅找到了牛车路，而且找到了年老的牛车夫。

东街头的牛车路情况与在编的《慈溪市地名志》信息表中所载一致：此路形成于1949年前，原为泥路，习称牛车路；1982年命名为车路球；1990年9月正式更名为盐车路；位于庵东镇振东村、宏兴村，南北走向，南起后江路，北至七塘公路，全长1180米。而另一条西街头的牛车路已改名为人和街371弄。

除了近代的庵东盐场，在慈溪境域内还有古代的龙山龙头盐场、石堰盐场（庵东盐场前身）和鸣鹤盐场。它们有无牛车，一时难以考证，暂且存疑吧。

由于牛车运输效率低，成本高，至1958年，盐区牛车被淘汰，改用手拉车（慈溪人称“钢丝车”）。1989年，庵东盐区有手拉车2194辆。当然后来又有了汽车。从发展历史来看，把牛车路改为盐车路，自有它的道理，因为盐车涵盖了牛车、手拉车、汽车。可惜这一改，雅化地名的同时，却遮掩了历史。

牛车路难找，牛车夫更难觅。87岁的姚新胡是搬盐站退休工人，家住庵东东街头的牛车路附近。其祖父、父亲均以赶牛车为生，家中原有牛车两辆。姚新胡三四岁时就随牛车上上下下，有时坐在牛背上，有时依偎在父亲身边。他说自己从12岁起独驾牛车，牛多是力气较大的水牛，车多是4个木轮的板车，路是雨天异常泥泞的烂路。运盐业务有时一天两车，有时隔天一车，有时甚至整天歇手，视盐的销量而定；去时满载盐，返时载运的往往是盐区不能或缺的柴、米等。

访谈结束之后，静思往昔之盐民和牛车夫，心里真有盐一般的沉重和感苦。

“纸上考古”：包公小说背后的故事

顾玮 吴央央

“挖掘”——《包待制》是最早的包公小说

“书籍具有文本和实物双重属性，古籍是书的一种，所以古籍的双重属性来自书籍的双重属性——古籍既有文本属性，也有文物属性。”天一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李开升关注更多的是古籍的文物属性。他说：“古籍中往往‘埋藏’着一些不被人注意的珍贵文献。”而这种发现的过程，他称其为“纸上考古”。

譬如，1931年，日本某图书馆在一部古籍封面的衬纸中发现了《金瓶梅》的几张残页，当时日本方面不太清楚其中的价值，将它们送到了中国学者手上，后来判定这是现存最早的《金瓶梅》残页。1933年，郑振铎发现了《金瓶梅》和《水浒传》的早期版本残页。1975年和1989年，上海图书馆先后发现了《忠义水浒传》和《三国演义》早期版本的残页。2013年，天一阁在进行古籍普查过程中，发现了《万历丙辰科进士同年序齿录》残页，2014

年，又发现明正德刻本《包待制》残页。它们全是在古籍封面衬纸中发现的。

“《包待制》残页是在正德刻本74册《文献通考》中找到的，当时，其中的3册封面衬纸中有《包待制》，其他则是另一种书《重刊京本增补说意四书通旨》的残页。”李开升说。《包待制》残页有5片，天一阁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复原后发现，第一个残片和第四个残片可以拼在一起，成为《包待制》卷上的第七页，文字基本上能连起来。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五个残片，能拼出第八页，但还有缺页。

李开升介绍，这本书之所以叫《包待制》，是因为书页版心处有“制”“上”字样。版心处一般印有书名的简称，明代前期喜欢将书名简化为一个字。既然“制”是书名里的一个字，而包公在书里被称为包待制，据此推测，书名应包含“包待制”字样，所以研究者将这

本书称为《包待制》。而书的卷册情况也能根据“上”字大致推测，要么是上下两卷，要么是上中下三卷。

研究者通过考证、比对，了解到《文献通考》是明正德十一年至十四年刘洪慎独斋刻、正德十六年重修本。那么，作为封面衬纸的《包待制》，也应该是在同一年或者稍微早一两年刊刻的，否则不一定保存下来。

《四书通旨》作为《文献通考》里“挖掘”出来的另一种书，它的牌记上清楚地记载有“皇明龙集庚辰 安正堂重新刊”。庚辰是正德十五年，《四书通旨》的版本非常符合研究者对时代的推测，恰好就在正德十六年的前一年。李开升说：“《包待制》和《四书通旨》就像同一考古坑里发掘出来的两件‘文物’，它们的版本年代应是非常接近的，上下不会差太多。”

《包待制》是范钦原藏书，400多年来没有动过，考察其版刻，为正德、嘉靖间建阳坊刻的典型风格。字体典型，版式皆为黑口、双顺黑鱼尾、四周双边。

结合这三方面的内容考察，可以推断《包待制》的刊刻时间，最大



正德刻本《文献通考》74册



文物残片复原

《包待制》卷上第七页（残片一、四）
《包待制》卷上第八页（残片二、三、五）

可能是正德十六年和正德十五年。

从文物角度来讲，《包待制》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包公小说。之前世最早的包公小说是《百家公案》，《包待制》的发现，把包公小说的历史又往前推了70多年。此外，从排版形式看，《包待制》类似于今天说的绣像小说。但早期的

绣像小说不一定每页都有图，譬如《包待制》第七页就没有插图，第八页才有，图在右半边一页上，上下各有一张图。而刊刻时间稍后的《百家公案》，图在上面，文字在下面，非常整齐，每一页都是如此。从中，也可以一窥明代绣像小说图文的发展过程。

梳理——包公故事源远流长

包公故事从宋代就开始流传了。最早的宋代话本有《三现身包龙图断冤》《合同文字记》；元杂剧则有《包待制陈州榷米》《打打打打鬼儿鬼》等，它们是包公案里的两则故事；发展到明清，包公小说规模庞大，有《包待制》《百家公案》《龙图公案》《三侠五义》等一大批。而20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《包青天》，曾一度掀起收视热潮。

李开升介绍：“从小说层面而言，《包待制》是最早的明代包公小说，但明代说唱词话中存在更早的包公故事。”1967年，在上海出土了明成化

年间的《乌盆传》说唱词话，这是包公案里很有名的一则故事。

事实上，研究者推测包公小说的出现应该远早于目前发现的《包待制》的成书年代，但古代书籍的流传，需要一个重要因素，那就是必须有收藏。否则，无论这本书在当时多么流行，发行了多少册，也会很快消失。而包公小说说唱词话类似于现在的通俗文学，当时的正统藏书家是不屑于收藏的。成化版《乌盆传》说唱词话是作为普通人的一个随葬品出现在墓中的，和藏书家的收藏不是一个概念。

与其他民间故事一样，包公故事也是一步步演化而来的。“我们不妨以乌盆案为例，看看明代包公故事的演变过程。”李开升说。

在成化版说唱词话《乌盆传》中，包公的身份是亳州知府，而在《包待制》里，包公身份为定州知府。在《乌盆传》中，被害人为福州富豪杨百万之子杨宗富，他死于应试的途中。凶手是烧窑贼人耿大、耿二兄弟俩。他们将被害人用毛巾绞死，得到了他的黄金白银及绫罗绸缎，还把被害人做成了一个歪乌盆。公差潘成从乌盆贩子孙小二那里买到了歪乌盆，然后帮助杨宗富告状。而在《包待制》中，被害人是扬州商人李浩，凶手的名字是丁千、丁万，杀人后获得黄金百两，并把被害人做成瓦盆。定州的王老买

得瓦盆，帮李浩告状。

从中可以看出，《包待制》里瓦盆子的故事应该不是直接从《乌盆传》演化来的，但故事的核心部分是一样的。《百家公案》比《包待制》晚了70多年，其中瓦盆子故事的主干就和《包待制》里完全一样了。包公的身份也是定州知府，其他如被害人的名字、身份、凶手的名字，包括被害的情况，以及告状人等，两个文本差异非常小。可见，《百家公案》和《包待制》有着很明显的传承关系。至于此后的《龙图公案》的传承关系就更明显了。

研究者通过对明代几个主要的包公故事的分析，发现《乌盆传》属于单独的一个体系。这是因为《乌盆传》是艺人用来说唱的底本，虽然出版之后也可以阅读，但和小说还是有区别。

《乌盆传》和元杂剧《打打打打鬼儿鬼》之间反而有一定联系，《盆儿鬼》中的主人公也姓杨，它们之间的相似处比小说要多一点。李开升认为，明代包公故事，至少呈现两条线索。

李开升说：“随着书籍的不断流传，越到后期，包公故事的内容越丰富。”在最早的包公小说《包待制》里，以二卷次或三卷次推测，最多不会超过50个故事。但到了《百家公案》，就有近100个回目、100个故事。之后的《龙图公案》，内容进一步丰富。到《三侠五义》和《七侠五义》，故事架构中引入了辅佐包公的各种江湖人士、大侠，而这些在《包待制》《百家公案》里是完全看不到的。

（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苑·国学堂，有删节。此为线上讲座。）



天一阁博物馆供图